

## 唐代典禮賦創作之文化情境探討

吳儀鳳

### 摘要

唐代有很多典禮賦，參酌唐代國家典禮之相關史料記載，可以有助於理解唐代文士是在何種文化背景和心態下創作如此大量的典禮賦。本文從文士所處的文化情境和創作心態入手，探討唐代典禮賦創作的文化情境，企圖更進一步地了解唐代文士大量創作典禮賦的背景和心境。從典禮賦的發展來看，唐代是典禮賦蓬勃發展的時期，也是創作上的巔峰時期。唐代典禮賦能對應於實際的唐代典禮禮目，命題廣泛，觸及的禮制很多。而其中月令與五行的觀念更是解讀唐代典禮賦的基本關鍵，多數典禮賦都涵攝著《禮記·月令》中的時令觀。而觀察唐代典禮賦更可以發現：典禮賦的創作有文士親臨典禮現場的事實存在，這也將有助於我們重新去理解、看待和評價唐代典禮賦。從文士創作典禮賦的心態來看，其心中往往具有根深蒂固的崇禮心態存在，結合史料來看，更可以看到唐代文士社會中的崇禮文化。透過對唐代典禮賦創作的文化情境探討將有助於從此一角度重新對唐代典禮賦進行不同於以往的評價和研究。

關鍵詞：唐代、典禮賦、文化情境、崇禮心態、創作心態

\* 本文乃筆者於2007年12月26日，首次發表於東華大學中文系所舉辦之「咖啡與學術第33場」研討會中，蒙系上同仁及研究生不吝給予意見；後又於2008年4月17日發表於東華大學中文系舉辦之「第三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蒙特約討論人蘇瑞隆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提供寶貴意見，之後投稿《政大中文學報》，蒙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意見，始修訂而成，在此謹致謝忱。本文亦為本人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七年度之專題研究計畫「唐賦的經藝書寫研究（II）：典禮賦」（97-2410-H-259-032-）之執行成果。

\* 吳儀鳳現職為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 The Creations of Ceremony Fu in Tang Dynasty

Wu Yi-feng

### Abstract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ceremony fu in Tang Dynasty. But they were not enough noticed by scholars. The ceremony fu were important material for research the national ceremony of Tang Dynasty. Writers wrote these fu with their own experience and their own value, thinking, believe. So we can research those writers' mind through the ceremony fu.

(1) We can see that the Tang literati made much of ceremonial Fu through the existence of huge numbers of Tang ceremonial Fu; (2) Via the works of ceremonial Fu, the biographies of Fu's writers, and many pertinent resources, we are able to know the literati's attitudes of ceremony worship; (3) The ceremonial Fu could present the ritual system of Tang state, thus being worthy of our great attention; (4) The aggregate of Tang ceremonial Fu is a lot more and more complete than the pieces of the same type of former dynasties; simultaneously, as the ceremonies were treated with high respect by the state and needed b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s well, it enables these Fu creations imply rich sociocultural meanings and that is also well worth deeply investigating; (5) To study the Tang ceremonial Fu,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writers' writing attitudes; therefore, we ought to grasp the era's atmosphere and the literati's attitudes and then we make appropriate interpretations afterwards.

Keywords: Tang Dynasty, ceremonial Fu, cultural situation , the attitude of ceremony worship, mentality of creator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Donghua University

## 一、前言

唐賦中有許多與典禮相關的賦題，若仔細去觀察並配合著唐代的國家典禮制度來看時，將會發現：這些典禮賦的寫作其實都與唐代施行國家典禮的背景有著緊密的關聯性。唐代描寫典禮的相關賦作很多，《文苑英華》卷 54 至 57，禋祀類 4 卷收錄 33 篇賦作<sup>1</sup>；《歷代賦彙》卷 47 至 52，計 6 卷收錄唐代典禮賦 52 篇<sup>2</sup>。根據統計，《歷代賦彙》收錄之 30 類賦作中，典禮類作品數量排名為第 11 名，禋祀類賦作的數量在《文苑英華》賦體的類別中排名為第 13。相較於其他各類，典禮賦所佔的分量可說是不容小覷。而且由於分類立目及歸類不同等原因，這還不是全部的唐代典禮賦，因有一些典禮賦在二書的分類上並不被納入禋祀或典禮類中，此先暫且不論。本文所欲探討之唐代典禮賦即與唐代禮制有關之賦篇作品，實則涵蓋範圍較廣，例如〈明堂賦〉、〈辟雍賦〉等實為重要的典禮進行場所，亦包含在「典禮賦」的範圍內。

這些與唐代禮制有著密切關聯的賦作，在缺乏對唐代國家禮制了解的情況下，將難以理解其內容。而由以往以抒情言志為主流的情志文學批評脈絡來看時，令人好奇何以這些作家要去寫作這一類作品？過去的文學研究者對這一類賦作由於評價很低，將其視為堆砌辭藻、空洞無物之作，故也向來不受重視，少有人提及，相關之研究也很罕見。惟近年來文化研究之風盛行，南京大學的賦學研究者許結（1957-）曾撰寫過兩篇與典禮賦有關之論文：〈漢賦與禮學〉、〈漢賦祀典與帝國宗教〉，二文收入其所著之《賦體文學的文化闡釋》一書中。而閱讀此二文必須與其〈漢賦與帝京文化〉一同參看。<sup>3</sup>許結主要以漢賦作為其研究的對象，將其置於歷史的縱深中進行觀察。許結認為：從先秦到漢代歷經政治上大一統的體制變化，從而漢代賦家也有著崇王道、尊帝京等的表現，因而賦家們企圖通過「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sup>4</sup>的方式，顯現其「體國經野」與「勤政恤民」的雙重作用。<sup>5</sup>而因為崇

<sup>1</sup> 賦作目錄參見文末附表一：《文苑英華》第一冊禋祀類收錄賦作一覽表。〔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明刻本，1979 年）。

<sup>2</sup> 賦作目錄參見文末附表二：《歷代賦彙》典禮類收錄唐代賦作一覽表。〔清〕陳元龍輯：《御定歷代賦彙》（京都：中文出版社，1974 年）。

<sup>3</sup> 許結此三篇論文均見於氏著：《賦體文學的文化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一書。

<sup>4</sup> 班固：〈兩都賦序〉，見《文選》，蕭統編、李善注：《文選注》（臺北：華正書局影印新校胡刻宋本，1974 年），卷 1，頁 21。

<sup>5</sup> 見許結：《賦體文學的文化闡釋》，頁 9。

王道，所以也推崇儒學的禮德思想，更有維護社會穩定的禮制秩序和倫理精神蘊涵在其作品中。他更指出：漢代賦家描繪的漢禮多為天子之禮，以顯示帝京風采與王道精神。<sup>6</sup>而且漢代大賦作手皆親歷盛典，既寫實，又誇張，充分顯示了那種國勢雄強、文德武功、禮樂彬蔚、四方賓服的帝京文化風采。<sup>7</sup>其於〈漢賦與禮學〉一文中則具體舉出一些實例來說明漢賦中的典禮描寫，包括：揚雄（前 53-18）〈河東賦〉記敘成帝帥群臣往祭后土之狀；班固（32-92）〈東都賦〉有關於天子春日行「元會禮」的描寫；張衡〈東京賦〉記有漢明帝「臨辟雍，初行大射禮」事的描寫。這些賦作的典禮描寫一方面體現以天子朝廷為中心，以安撫四裔為目的的禮制觀，一方面則可以讓人看到漢代禮制的變化。<sup>8</sup>

## 二、漢唐典禮賦之概況

考察唐以前典禮賦的寫作概況，可自漢代開始。漢代典禮賦主要描寫的是郊祀之禮。董仲舒（前 176-104）《春秋繁露·郊事對》云：「古者天子之禮，莫重于郊。」<sup>9</sup>《漢書·郊祀志》亦云：「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sup>10</sup>考察漢代的典禮賦作，多為郊祀賦，如東漢時的鄧耽有〈郊祀賦〉，其云：

咨改元正，誕章厥新。豐恩羨溢，含唐孕殷。承皇極，稽天文，  
舒優遊，展弘仁，揚明光，宥罪人。群公卿尹，侯伯武臣，文  
林華省，奉贊厥珍。夷髦盧巴，來貢來賓。玉璧既卒，於斯萬  
年。穆穆皇王，克明厥德。應符蹈運，旋章厥福。昭假烈祖，  
以孝以仁，自天降康，保定我民。<sup>11</sup>

然此段賦文係錄自《初學記》卷 13 之殘篇，故此賦並不完整。賦題為郊祀，現存段落大意為：行郊祀禮就是要向天下人昭示，新帝要繼皇統，合天意，

<sup>6</sup> 同前註，頁 20。

<sup>7</sup> 同前註，頁 21。

<sup>8</sup> 同註 5，許結：〈漢賦與禮學〉一文。

<sup>9</sup> 董仲舒撰、蘇輿義證：〈郊事對〉，《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414。

<sup>10</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郊祀志〉，《漢書集注》（臺北：鼎文書局，1991 年），頁 1253-1254。

<sup>11</sup> 見費振剛等校注：《全漢賦校注》（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 年），頁 825。

使國家太平，運交長久，引導人民信守仁義，讓皇恩普照，大赦罪人。<sup>12</sup>賦中述及行郊祀禮時，滿朝文武百官，上至卿相，下至文臣武將，親貴之官，紛紛敬獻珍寶。各地尤其是少數民族地方首領，也於郊祀大禮時紛紛納貢稱臣。篇幅雖短，但仍可看出其作為郊祀賦所展現之帝國書寫特質。

郊祀之賦，揚雄之〈甘泉賦〉即已首開先聲。漢成帝時，揚雄跟隨聖駕前往甘泉宮，行郊祀之禮，作〈甘泉賦〉。後又跟隨皇帝祭后土，又作〈河東賦〉。<sup>13</sup>賦中運用了神話一般的想像和靡麗的文辭以寫其誇張侈麗。由於是郊祀的祭典，故而賦中又充滿了某種宗教性意味。但因賦文用字奇偉，鋪張華麗的文辭，反而使得讀者在閱讀和文意理解上容易產生障礙。這類以郊祀為主題的賦作，在後來唐代賦作中仍有，就典禮賦的寫作傳統來看的話，漢賦中典禮賦的數量不像唐賦中那麼多、那麼明顯，但已可略見漢人對郊祀典禮的重視，並以賦體頌揚表現的做法。東漢時李尤（約 55-135）的〈辟雍賦〉，也是唐代典禮建築賦中有的題目，李尤〈辟雍賦〉云：

卓矣煌煌，永元之隆，含弘該要，周建大中。蓄純和之優渥兮，  
化盛溢而茲豐。

太學既崇，三宮既章。靈臺司天，群耀彌光。太室宗祀，布政  
國陽。辟雍嵒嵒，規圓矩方。階序牖闔，雙觀四張。流水湯湯，  
造舟為梁。神聖班德，由斯以匡。喜喜濟濟，春射秋饗。王公  
群后，卿士具集。攢羅鱗次，差池雜遝。延忠信之純一兮，列  
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群卿，加休慶德，稱壽上觴。戴  
甫垂畢，其儀蹌蹌。是以乾坤所周，八極所要。夷戎蠻羌，僨  
耳哀牢。重譯響應，抱珍來朝。南金大路，玉象犀龜。<sup>14</sup>

由此段賦文看來，這類賦作與頌體較為接近。永元是漢和帝劉肇的年號，為公元 89-104 年，賦當作於此時。漢光武帝中元 2 年（56），起明堂、辟雍、靈臺。<sup>15</sup>賦中「三宮」所指即為此。而「神聖班德」中之「神聖」指的正是君王。「三后八蕃」則泛指諸侯國君。此賦稱讚漢和帝永元之時，修建辟雍，辟雍即太學，賦中歌頌國家崇尚教育，明堂、辟雍、靈臺三宮也都發揮其應

<sup>12</sup> 同前註，頁 826。

<sup>13</sup> 同前註，頁 230-253。

<sup>14</sup> 同前註，頁 574。

<sup>15</sup>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卷 44，頁 1427。

有之功能。李尤作此賦有著出自於對國家（或皇帝）崇尚禮樂的歌頌。但李尤的這篇〈辟雍賦〉是從類書中輯佚出來的，顯然看起來也是不完整的。不過僅就現存的段落看來，其中已具備了多項元素，包括描寫諸侯王及公卿大臣的朝賀，還有四夷的來貢及賓服，而這也正是帝國書寫式的話語。

再就六朝時期的賦作中尋找與典禮相關的賦作，有〈藉田賦〉<sup>16</sup>、〈南郊賦〉<sup>17</sup>、〈元日朝會賦〉、〈辟雍鄉飲酒賦〉<sup>18</sup>、〈講武賦〉<sup>19</sup>。較特別者如傅玄（217-278）〈元日朝會賦〉首段寫出元日朝會的熱鬧景象，天還未明，宮殿前已是火光煌煌，大家都等在門口，待宮門開啟，從容俟次而入，依次就位而立。包括海外來的使臣也是一樣。而這一天因為是元日朝會，因此是充滿節慶歡樂氣氛的日子，使節和大臣們紛紛獻上各地的貢品、禮物。在固定的元日朝會的朝儀鐘鼓樂聲中進行這一場典禮。整個禮儀儀式還包括饗宴，饗宴完畢，「六樂畢奏，磬管鏘鏗」，在樂聲中完成這一場充滿儀式性，但又帶著歡慶意味的元日朝會。又如傅玄的〈辟雍鄉飲酒賦〉描寫皇帝親自駕幸辟雍，行鄉飲酒禮，外賓亦在旁觀看。整個鄉飲酒禮的描述重點在於其間所展示的「揖讓而升，有主有賓」、「俎豆有數，威儀翼翼」這樣一種「禮雖舊制，其教惟新」和「知禮教之弘普」的思想。傅玄強調的是本國之禮儀教化，顯然是有面對外國使節時所刻意強調中國為禮儀之邦的意思。這些內容都為唐代的典禮賦繼承並加以發揚光大。這些國家典禮原本就出自於經典（如三《禮》）中的文字記載，但是在一些帝王和儒學之士的相互作用下促成其實踐，到了唐代更可以說是禮制的集大成了。

綜合來看，雖然漢魏六朝時期也有典禮賦，然而可惜的是今日我們所能見到的漢魏六朝的典禮賦作並不完整，篇幅也較少、較為有限。真正大量化、且全面性地撰寫與典禮相關的各種題目以及徹底地在賦作中將國家典禮予以普遍性書寫者，這種成熟的發展，可說是在唐代。唐以前的典禮賦也有如春射秋饗、鄉射、鄉飲之類題材的撰寫，但這在唐以前只是偶爾、零星地寫作，在內容上也不同於唐人那種完整篇幅、限韻文字，主題扣緊式的寫法。這當然多少

<sup>16</sup> 〈藉田賦〉有五位作者，包括曹植（嚴可均編：《全三國文》，卷 13，《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繆襲（《全三國文》，卷 38）、徐爰（《全宋文》，卷 40）、任豫（《全宋文》，卷 40）和潘岳（董志廉校注：《潘岳集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年〕）。

<sup>17</sup> 郭璞：〈南郊賦〉，見嚴可均編：《全晉文》，卷 120。

<sup>18</sup> 傅玄：〈元日朝會賦〉、〈辟雍鄉飲酒賦〉，見嚴可均編：《全晉文》，卷 45。

<sup>19</sup> 虞世基：〈講武賦〉，見嚴可均編：《全隋文》，卷 14。

與唐代科舉考試以詩賦取士有關。因此，觀察典禮賦由唐賦入手，反而更能看出賦與國家典禮間那種緊密的關聯。

唐代典禮賦是在唐代典禮制度的文化背景下寫作的，故欲了解典禮賦必先了解當時的禮制。有關唐代的典禮，目前已有的研究，如陳成國（1946-）有《中國禮制史：隋唐五代卷》<sup>20</sup>、任爽（1953-）有《唐代禮制研究》<sup>21</sup>，而雷聞在《唐研究》第7卷中則有一書評評論此二書。<sup>22</sup>另張文昌撰有《唐代禮典的編纂與傳承——以大唐開元禮為中心》<sup>23</sup>，其中第三章第三節表四為《大唐開元禮》卷目與禮目對照表，亦為本文末附表三之參考。

唐代禮的內容名目繁多，一般而言，有吉禮、賓禮、軍禮、嘉禮、凶禮五種，但唐代典禮賦並未涵蓋所有禮目，其中完全未涉及者為凶禮，故本文完全不觸及凶禮。本文依據任爽《唐代禮制研究》上篇目錄中所提供之唐代禮制架構，配合《大唐開元禮》的禮目，將唐代典禮賦篇目與該禮目相關者納入表格中，製作成附表三：唐代典禮賦之禮目架構一覽表。

參看《大唐開元禮》之禮目時發現：任爽所提供之禮制架構優點在於眉目清爽，但在《大唐開元禮》中的禮目很多、很細，有前述架構未能盡其詳之處。將《大唐開元禮》中所列禮目略去與唐代典禮賦完全無關之祀典禮目（如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先蠶等）後，其與典禮賦相關之禮目仍多達27種。<sup>24</sup>《大唐開元禮》所列禮目過於詳細、繁多，依張文昌所列之「大唐開元禮卷目與禮目對照表」所列，其各式禮目總計有153種。本文為求行文簡潔，附表三中所列部分稍經省併。

若依《大唐開元禮》中所記載之唐代禮制來看，唐代典禮賦之中有許多與之相關之作，具體之篇目可參考文末附表三。由附表三的典禮賦例子中可以看出唐代典禮賦寫作數量很多，同時參與寫作的文人也多，觸及的禮制面向很廣，內容可說十分豐富。相較於之前的典禮賦，唐代典禮賦有一個很大的飛躍

<sup>20</sup> 陳成國：《中國禮制史：隋唐五代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sup>21</sup> 任爽：《唐代禮制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sup>22</sup> 雷聞：〈書評：陳成國《中國禮制史·隋唐五代卷》、任爽《唐代禮制研究》〉，《唐研究》第7卷，頁532-541。

<sup>23</sup> 張文昌：《唐代禮典的編纂與傳承——以大唐開元禮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6月）。

<sup>24</sup> [唐]蕭嵩編撰：《大唐開元禮》（與《大唐郊祀祿》合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和進展。之前的典禮賦多只集中於郊祀、辟雍、朝會等少數典禮的描寫，無論就篇幅、數量和對典禮描寫的廣泛度而言，唐代都大大超越了前代。

雖然從典禮賦的內容看來，多為歌功頌德之辭，但就其特色而言，唐代典禮賦顯示出：唐代文士對典禮的重視，並且文士以賦體對典禮進行描寫與歌頌的風氣很盛。從唐代典禮賦中也可以看出：唐人對於南郊祭天之禮的重視，因此與南郊禮相關的賦作很多，還有對五方帝的祭祀，以及皇帝視學、閱兵等公開活動及行程，以皇帝為主去施行國家典禮的描寫都可以在唐代典禮賦中找到相關的記錄，因此我們可以說：唐代典禮賦的創作是非常活躍和蓬勃發展的。

### 三、唐代典禮賦的關鍵符碼：月令與五行

由於唐代典禮賦並不突顯作者個人的生命情志，故一般而言，少有人去肯定其文學價值。但是欲讀懂典禮賦必須了解當時相關的社會文化背景，而且必須掌握一些解讀的關鍵和文化符碼，才能做出正確的理解。由於典禮賦所蘊含之背景知識很豐富，必須了解唐代國家典禮和文士所處的社會文化及其心態，如此才能逐一拼湊出唐代文士生活的圖像和還原賦篇原本寫作的場景。倘若不了解這些典禮賦的內容，將無法理解唐人何以要如此大量地撰寫這一類作品，更無法進入唐代文士實際生活的社會情境中。

典禮賦之解讀因涉及相關禮制，故必須具備相關的背景知識，但禮制的內容過於龐大和複雜，閱讀唐代典禮賦，初步發現：其中很重要的關鍵符碼乃是月令與五行的相關辭彙，掌握此一關鍵，將有助於典禮賦的解讀。月令與五行的觀念主要見於《禮記·月令》<sup>25</sup>、《淮南子·時則訓》和《呂氏春秋·十二紀》。唐代典禮賦在這方面表現最為明顯的是與祀五方帝有關之賦作，如〈服蒼玉賦〉<sup>26</sup>。《禮記·月令》載春天之時，包括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天子皆「服倉玉」。<sup>27</sup>而〈服蒼玉賦〉云：「天配五色，惟春也蒼然。地孕萬物，惟玉也堅焉。玉可久持，故君子比德於玉。」賦中點明時令是在「東方木德之令，蒼本靈威之紀」又云：「四氣莫先乎春陽」、「五位莫首乎東方」、「我乃應春氣之德」，由此可知：此賦必與〈月令〉所云春日迎東郊之禮有關。

<sup>25</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月令〉，《禮記正義》（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影印南昌府學本），卷14至17，頁279-357。

<sup>26</sup> 獨孤申叔：〈服蒼玉賦〉，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卷617，頁6985。

<sup>27</sup> 同註25，《禮記·月令》，卷15，頁299。

又如《禮記·月令》云：「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sup>28</sup>唐人有〈東郊迎春賦〉<sup>29</sup>，賦中充滿了月令的相關文化符碼，如賦云：「出左个而迎春」、「服蒼玉，載青旗」、「東郊之中」、「知太昊之整轡」，這些正是〈月令〉中所云：

孟春之月，……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sup>30</sup>

若直接看賦作，其內容也必須關聯著《禮記·月令》來作解讀，例如〈北郊迎冬賦〉，其云：「律變於冬，必須時而冬命，水盛於北，亦隨方而北迎，所以修舊典，闡鴻名。受太史之先謁，率群辟而躬營，況肅殺以北陸，將昭宣乎上京。於時時和歲豐，勞農息力，結冰於坎，改火於國……以居乎左个。而司晨者黑帝，必祭於北郊……」<sup>31</sup>《禮記·月令》云：「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sup>32</sup>又云：「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裘。」<sup>33</sup>

唐人對於月令與五行的重視，尚可以從唐代「讀時令」的禮制中看出。唐代禮制中有「讀時令」之禮，再者，由史書記載中也可見到唐人對禮制依時令行事之重視。

《舊唐書·太宗本紀》載：「太宗貞觀十四年春正月庚子，初命有司讀時令。」<sup>34</sup>又，《舊唐書·玄宗本紀》載：「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冬十月，制自今年每年立春日迎春於東郊，其夏及秋冬如常，以十二月朔日於正殿受朝，讀時令。」<sup>35</sup>而讀時令之實行方式，在《舊唐書·玄宗本紀》載：「開元二十六年夏四月己亥朔，始令太常卿韋縚讀時令于宣政殿，百僚於殿上列坐而聽之。」<sup>36</sup>

<sup>28</sup> 同註25，《禮記·月令》，卷14，頁286。

<sup>29</sup> 王起：〈東郊迎春賦〉，《全唐文新編》，卷641，頁7226；謝觀：〈東郊迎春賦〉，卷758，頁8931。

<sup>30</sup> 同註25，《禮記·月令》，卷14，頁279-285。

<sup>31</sup> 王起：〈北郊迎冬賦〉，《全唐文新編》，卷641，頁7229-7330。

<sup>32</sup> 同註25，《禮記·月令》，卷17，頁341。

<sup>33</sup> 同上註，頁341-342。

<sup>34</sup> 劉昫：《舊唐書·太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3，頁51。

<sup>35</sup> 《舊唐書·玄宗本紀》，卷9，頁208、209。

<sup>36</sup> 同上註，頁209。

唐代史籍所載唐人對時令的重視在此可舉三例，第一例為武則天欲於孟春講武，而王方慶以不合時令為勸，建議改至孟冬。武則天接受了他的建議。<sup>37</sup>第二例如唐中宗本欲於盛夏下令殺某人，亦被徐堅以不合時令而勸阻了。<sup>38</sup>第三例見於《新唐書·李程傳》，記載德宗季秋外出畋獵，覺得天氣嚴寒，但〈月令〉中卻說「九月猶衫，二月而袍」，德宗想要修改月令，李程說：「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然止。<sup>39</sup>

而唐賦中也有幾篇是與讀時令有關之作，如韋縝〈讀春令賦〉其中有云：「穆穆秘殿，明明我皇，體乾道以從事，閱春令而頒方，可謂君奉時而罔失，臣出言而有章。」<sup>40</sup>可見唐人重視禮制，強調依時行事，遵守大自然四時的規律，並用之來規範君王。類似之作尚有〈時賦〉<sup>41</sup>、〈聖人以四時為柄賦〉<sup>42</sup>、陳昌言〈先王正時令賦〉<sup>43</sup>。其中〈先王正時令賦〉云：「我唐百王居盛，九葉伊聖，昧爽無忘乎順序，動息必繇乎時令。」此「九葉」點明為德宗之時，又依賦文看來，是作於仲秋之時，蓋因歲差之故，故置閏月以糾正歲差，使時令歸之於正。另有〈仲冬時令賦〉三篇，<sup>44</sup>其中如「其神元冥，厥德在水」都指明了是北方。楊寬〈月令考〉一文曾指出：《禮記·月令》與《淮南子·時則訓》、《呂氏春秋·十二紀》三者大體相同，僅文字稍有出入。<sup>45</sup>他同時在該文中將〈月令〉與五行等相關之配合列了一張表，該表有助於掌握本文在此所說之符碼（code），為便於觀覽謹將該表製作成附表四。附表四主要是四時加中央與五方、五行、五獸、五帝、五星等的搭配。但另外依〈月令〉之說，還需要更細致的 12 月加中央的部分，主要在於律呂和天子明堂居處，因此又製附表五附於文末以便觀覽。

<sup>37</sup> 《舊唐書·王方慶傳》，卷 89，頁 2900。

<sup>38</sup> 《舊唐書·徐堅傳》，卷 102，頁 3175。

<sup>39</sup> 歐陽修：《新唐書·李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131，頁 4511。

<sup>40</sup> 韋縝：〈讀春令賦〉，《全唐文新編》，卷 400，頁 4609；又見於《文苑英華》，第 1 冊，卷 22，頁 101-102。

<sup>41</sup> 〈時賦〉，《文苑英華》，第 1 冊，卷 24，頁 109；又見於《全唐文新編》，卷 401，頁 4622。

<sup>42</sup> 同上註，〈聖人以四時為柄賦〉。

<sup>43</sup> 〈先王正時令賦〉，《全唐文新編》，卷 481，頁 5684。

<sup>44</sup> 三篇〈仲冬時令賦〉，蕭昕之作見《全唐文新編》，卷 355，頁 4057；張欽敬之作見《全唐文新編》，卷 401，頁 4627、叔孫元觀之作見《全唐文新編》，卷 440，頁 5133。三篇賦作又見於《文苑英華》，第 1 冊，卷 23，頁 106-107。

<sup>45</sup> 參見楊寬：〈月令考〉，收入氏著：《楊寬古史論文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463。

依據附表四和附表五，將有助於掌握唐代典禮賦解讀的關鍵字，這些關鍵字皆因這一套文化符碼方得以解讀。例如張餘慶有一篇〈祀后土賦〉<sup>46</sup>，其內容便與《禮記·月令》季夏後所云中央土有關，其云：「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sup>47</sup>〈祀后土賦〉言及：「比祠后土而幸河東」，又云：「黃琮展前以備陳」、「肅黃祇之神位」皆為中央土，色尚黃之故。而《新唐書·玄宗本紀》載唐玄宗開元11年2月壬子，如汾陰，祠后土；開元20年11月也有；王昌齡有題為〈駕幸河東〉之詩。<sup>48</sup>〈祀后土賦〉當是在玄宗祀后土之背景下所作。又如王起〈律呂相生賦〉：「黃鍾建子以為本，林鍾建未以為君」<sup>49</sup>及王起〈葭灰應律賦〉：「仲夏將臨，則蕤賓設候；孟秋既屆，乃夷則應期；大呂具實，而冬窮於丑；大簇已散，而春蠹於寅。」<sup>50</sup>二賦都是律呂與12月的配置，若是缺少了附表五的知識，將無法解讀上述兩段文字。

此外，土德更是唐代以此而興之聖符，故有〈日五色賦〉限「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為韻」，文中便說明了土德「表王氣於皇家」，<sup>51</sup>而呂太一〈土賦〉更說明：「坎為水兮離為火，東方木兮西方金，惟土德之為大，處中位而君臨。」<sup>52</sup>韋岫〈土賦〉更以第一人稱方式云：「吾（土）為五方之主，為萬聖之雄，造邦本，立大中，布而為金木水火，分而為南北西東。」<sup>53</sup>又如〈二氣合景星賦〉一開始云：「我皇乘土而王。」<sup>54</sup>至於楊炯〈老人星賦〉云：「符水德之兆千齡。」<sup>55</sup>由於是在武周時所作，故稱水德。

又如蕭昕有一篇〈總章右个賦〉<sup>56</sup>，總章右个乃是明堂中之一室，明堂乃是天子布政之宮。<sup>57</sup>依〈月令〉所言，天子隨著每個月的不同，變換其所居之處，參見附表五所整理之一覽表。若依附表五查詢可知：總章右个是季秋時所

<sup>46</sup> 張餘慶：〈祀后土賦〉，《文苑英華》，第1冊，卷56，頁254。

<sup>47</sup> 同註25，《禮記·月令》，卷16，頁321-322。

<sup>48</sup> 見王昌齡撰、李國勝校注：《王昌齡詩校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sup>49</sup> 王起：〈律呂相生賦〉，《全唐文新編》，卷641，頁7230。

<sup>50</sup> 〈葭灰應律賦〉，《全唐文新編》，卷641，頁7231。

<sup>51</sup> 李程：〈日五色賦〉，《文苑英華》，第1冊，卷5，頁28。

<sup>52</sup> 呂太一：〈土賦〉，《全唐文新編》，卷295，頁3328。

<sup>53</sup> 韋岫：〈土賦〉，《全唐文新編》，卷792，頁9530。

<sup>54</sup> 裴度：〈二氣合景星賦〉，《文苑英華》，第1冊，卷9，頁47。

<sup>55</sup> 楊炯撰、徐明霞點校：《楊炯集》（臺北：源流出版社，1983年）卷1，頁11。

<sup>56</sup> 蕭昕：〈總章右个賦〉，《全唐文新編》，卷355，頁4056。

<sup>57</sup> 參見《三輔黃圖·卷五》（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頁39。

居之處，而〈總章右个賦〉中也的確寫出了明堂建築的一些特色，例如明堂是天圓地方，賦云：「分五行以配德，合四時而導氣，審圓象以規天，揆方儀而法地，因節候之開闢，得陰陽之奧秘。」其在時間上則點出是在「金風夕扇，收帝藉於西成」及「休茲百工，草黃月季，虛正昏中」之時，「金」、「西」皆指的是秋季，「昏虛中」指的也是季秋黃昏時，虛星在南方天空正中。<sup>58</sup>

明堂在唐代武則天手中建造完成，雖經焚毀，後又新造，唐代的禮制便主要是在歷經太宗、高宗、武則天和玄宗等帝王的不斷修訂上逐步完備，而且是將這些禮制完全付諸實踐的。由前述種種可以得知：唐人對於月令與五行的重視可以說這已經成為他們生活中、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了。故而唐代典禮賦可說是對唐代社會文化生活此一面的真實反映，而並非只是單純的紙上作文。

#### 四、唐代典禮賦創作的文化情境：文士親臨典禮的事實

唐代典禮賦的作者究竟是在何種情境下來創作典禮賦的？從典禮賦中可以找到若干蛛絲馬跡。如李為的〈日賦〉，賦一開始云：「仲春上日，率公卿大夫朝日於東郊，祗祀畢，太史進曰……」<sup>59</sup>又或者如蕭昕〈仲冬時令賦〉云：「於是我皇乃親帥百辟，觀隙三農，整六軍以耀武，肆大閱於仲冬。然後乃即太廟，建玄旗，事神率禮，撫俗觀詩。……」<sup>60</sup>上述賦作均點明了其寫作的背景，一是仲春朝日於東郊，一是仲冬皇帝行大閱禮、即太廟行祭祀之禮。這些是賦中清楚點明寫作背景的。

其次，如彭朝曠賦題為〈勤政樓視朔觀雲物賦〉，從題目中便可得知其所說的「勤政樓」實乃唐代真實的建築物。查《兩京城坊考》<sup>61</sup>一書，得知勤政樓位於長安皇城內，在興慶宮的西南隅，原名「勤政務本樓」，簡稱「勤政樓」，<sup>62</sup>今參考日本學者平岡武夫（1909-）所繪製之復原圖<sup>63</sup>將之標示出來附於文末。賦題中「視朔」指的則是古代天子、諸侯於每月朔日祭告祖廟後，在太廟上聽政。而「視雲物」則是古代太史掌管天文星象，要觀測天空中雲物的形態和變化，就民生而言與氣象有關，就政治上而言則和祥瑞或災異有關。因此，彭朝

<sup>58</sup> 參《禮記·月令》季秋。

<sup>59</sup> 李為：〈日賦〉，《文苑英華》，第1冊，卷2，頁15。

<sup>60</sup> 蕭昕：〈仲冬時令賦〉，同前引書，卷23，頁107。

<sup>61</sup> 徐松：《兩京城坊考》（與《三輔黃圖》合刊）（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

<sup>62</sup> 參見《兩京城坊考·卷一》，頁21。

<sup>63</sup> 興慶宮位置參見文末「附圖一：興慶宮位置圖」，勤政務本樓位置參見「附圖二：勤政樓位置圖」。

曦此賦的賦題可以說是清楚地點出了他是在勤政樓，某一個朔日（即初一），皇帝舉行視朔儀式的情形下，觀見天上雲物。一般而言，賦的內容都是歌頌祥瑞，故此時定是有祥瑞雲彩出現，在此一特定背景下寫成這篇賦作。這是從賦題本身可以看出典禮賦有時會具體地把典禮舉行的時、地背景等清楚地交代出來。

另外，例如元稹的〈郊天日五色祥雲賦〉，其云：

臣奉某日詔書曰：「惟云祀月正之三日，將有事於南郊。」直  
端門而未出，天錫予以雲瑞。是何祥而何吉？臣拜稽首，敢言  
其實。陛下乘五位而出震，迎五帝以郊天。五方騰其粹氣，故  
雲五色以相宣。」<sup>64</sup>

此賦是元稹在有事於南郊之日，看見天上五色祥雲，故而歌頌祥瑞之作。《唐會要·卷二十九》記載：「長慶元年正月二日，有事于南郊，出東省門，日抱珥，五色。宰臣供奉官，竝于駕前稱賀。」<sup>65</sup>估計元稹應當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寫作此賦的。

由第二節及文末附表三所列唐代典禮禮目，配合《兩唐書·禮儀志》及《唐會要》來看，可以發現：典禮在唐代是經常舉行，且名目非常繁多的。初時會以為這些典禮類賦作，是援引經書典故紙上作文，不過在閱讀《新舊唐書·禮儀志》後，再進一步去了解唐代禮制，乃發現這些典禮賦其實很具有唐代典禮文化的代表性。了解唐代對於典禮的重視後，再來看典禮賦，可以說絕大多數的典禮賦其寫作都是作者具有參與典禮的親臨現場的真實感受下所撰作之產物。文士實際參與國家典禮，因為有著眾人集體參與的真實感和臨場感，故而這些典禮賦具有高度社會性和宗教性的文化意涵，值得予以重視，它們需要被重新解讀和看待。

唐代施行禮制的客觀事實，可以從史籍閱讀中得知。讀《新、舊唐書·禮儀志》使我們了解唐代士人對國家典禮的重視。唐初，房玄齡、魏徵等人就編有《貞觀禮》；而後高宗時，長孫無忌、杜正倫、李義府、李友益、劉祥道、許圉師、許敬宗、韋琨等人又增之為 130 卷，是為《顯慶禮》；但《顯慶禮》的評價不太好，於是《貞觀禮》也還是並用之。玄宗開元 14 年，張說建議針對前述二禮儀注不同處，加以修訂，以為唐禮。於是詔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

<sup>64</sup> 元稹撰、冀勤點校：《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重印），卷 27，頁 326-327。

<sup>65</sup> 王溥：《唐會要·卷二十九》（臺北：世界書局，1974 年），頁 538。

李銳去世後，由蕭嵩繼續，加上王仲丘，撰定 150 卷的《大唐開元禮》。史稱：「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sup>66</sup>

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為《郊祀錄》10 卷。今有《大唐開元禮》和王涇的《大唐郊祀錄》<sup>67</sup>，加上《唐會要》和史書中的記載，可以確知唐代之時禮儀的繁備。而五禮之中唯有凶禮與唐賦內容無關，其餘皆多少有所涉及，而就中最主要者乃在吉禮。

唐代所祀之神頗為廣泛，包括大祀、中祀、小祀各種神祇，大祀包括天、地、宗廟、五帝及追尊之帝、后。中祀包括社、稷、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帝社、先蠶、七祀、文宣、武成王及古帝王、贈太子。小祀包括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伯、雨師、靈星、山林、川澤、司寒、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州縣之社稷、釋奠。《新唐書·禮儀志》說這各式待祀神祇有 46 種之多，而其中必須天子親祠者有 24 種之多。而每年固定的常祀也有 22 種之多，包括：冬至、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季秋，大享于明堂；臘，蜡百神于南郊；春分，朝日于東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夏至，祭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仲春、仲秋上戊，祭于太社；立春、立夏、季夏之土王；立秋、立冬，祀五帝于四郊；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臘，享于太廟；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藉。<sup>68</sup>

唐賦之中有祀昊天上帝、祀后土、及祀五帝于四郊者，還有祀靈星者。這些賦作明顯地說明了唐人在賦作中去表現當時的禮文化。也因此有必要對唐代文士對於禮制的重視做更多的說明，以便理解文士創作這些典禮賦的心態和背景。以下即透過唐代文士對封禪禮的重視和禮文化的重視等兩方面，列舉若干具體的實例來證明唐代文士的崇禮文化心態，而此一心態背後是有著強烈的文化信仰和使命感存在的。

## 五、典禮賦的創作——以封禪禮為例

唐代文士表現在封禪禮上的心態是令人感到好奇的。他們熱烈地上書要求皇帝行泰山封禪大禮，而且在唐玄宗完成封禪泰山之禮後他們還覺得不夠，又要求玄宗封禪西嶽華山。封禪原本是古代帝王至泰山舉行祭祀天地神祇的一種

<sup>66</sup> 《新唐書·禮儀志》，卷 11，頁 309。

<sup>67</sup> [唐]王涇：《大唐郊祀錄》（與《大唐開元禮》合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年）。

<sup>68</sup> 《新唐書·禮儀志》，卷 11，頁 310。

宗教式活動，<sup>69</sup>秦始皇、漢武帝、漢光武帝都曾行過封禪之禮，司馬遷在《史記·封禪書》中亦云：「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sup>70</sup>在《管子·封禪篇》中曾說：「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其中列舉了無懷氏、虧羲、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堯、堯、舜、禹、湯、周成王，「皆受命然後得封禪。」<sup>71</sup>封禪之禮在經過秦始皇、漢武帝到漢光武帝之時，光武帝將封禪典禮定型為儒家化的國家最高祭天大典。<sup>72</sup>因而在東漢之時，封禪儀式就以象徵儒學之社會秩序和思想信仰的宗教化姿態出現了。<sup>73</sup>《白虎通·封禪》云：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sup>74</sup>

袁宏《後漢紀·光武皇帝紀卷八》亦云：

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sup>75</sup>

帝王登泰山，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是行封禪禮的主要意義。但是帝王想要行封禪禮也並不是那麼容易之事。因為「雖受命而功不至」、「德不洽」，沒有政績，國家不太平，沒有祥瑞，都不能行封禪之事。<sup>76</sup>唐太宗時百官上表請

<sup>69</sup> 參見湯貴仁：《泰山封禪與祭祀》（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頁2。

<sup>70</sup> 司馬遷：《史記·封禪書》（臺北：鼎文書局，1993年），卷28，頁1355。

<sup>71</sup> 黎翔鳳：《管子校注·卷十六·封禪第五十》（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952-953。

<sup>72</sup> 參見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跡》（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頁229。有關封禪禮制的起源、歷代封禪禮的發展與演變，以及封禪禮隨著不同帝王施行時所蘊含之文化意義轉化等深入的論述，此書皆有詳細的探討。

<sup>73</sup> 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跡》，頁232。

<sup>74</sup> [漢]班固撰、[清]陳立疏證、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卷六·封禪》（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278。

<sup>75</sup> 袁宏：《後漢紀·光武皇帝紀卷第八》（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53-154。

<sup>76</sup> 參見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跡》，頁331，及湯貴仁：《泰山封禪與祭祀》，頁3-4。

求封禪，據《唐會要·卷七》所載，陸陸續續地一直有百僚及雍父老詣朝堂上表請封禪，<sup>77</sup>但皆欲行又止，功虧一簣，終唐太宗之世都未能東封而只能望泰山興嘆。<sup>78</sup>之後由唐高宗完成了封禪泰山的願望。唐高宗麟德2年10月丁卯，高宗自東都洛陽出發，前往東嶽泰山，據載：

從駕文武兵士，及儀仗法物，相繼數百里，列營置幕，彌亘郊原。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國、罽賓、烏蒞、崑崙、倭國及新羅、百濟、高麗等諸蕃酋長，各率其屬扈從，穹廬氈帳，及牛羊駝馬，填候道路。是時頻歲豐稔，斗米至五錢，豆麥不列于市，議者以為古來帝王封禪，未有若斯之盛者也。<sup>79</sup>

在這次的封禪禮中武則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積極地推動和參與這次封禪之事，之後她更命嵩山為神嶽，前往嵩山行使大典。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跡》對此剖析道：

從唐高宗的泰山封禪到武則天的嵩山封禪，卻又是武則天謀國篡權、革唐之命，再造政治新格局的重要布局。<sup>80</sup>

在宗教信仰的神聖作用下，禮儀形式往往被賦予了特定的象徵意義，而儀式種種也反映了主體內在的觀念意識和心理狀態，成為神人之間以及向社會傳遞信息的重要媒介。<sup>81</sup>行封禪禮不只是帝王欲展現其權力與正統性的場域，也是唐代文士們的一種文化嚮往。這一點可從文士們如此熱切地，一再上書要求皇帝行封禪禮這一點看出來，究竟他們背後的個人心態為何？值得進一步去探究。

儘管行封禪禮是皇帝心中所願，但從相關史料中可以看出：他仍需要文武百官和地方人士不斷地上表敦請和催促，並且客觀條件成熟下才能行此封禪之事。

唐玄宗也是類似這樣的情況，他於開元13年進行了泰山封禪之典。但這樣還不夠，「開元十八年，百寮及華州父老，累表請上尊號，並封西嶽，不允。」

<sup>77</sup> 參《新唐書·太宗本紀》及《唐會要·卷七》。

<sup>78</sup> 可參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跡》，頁322-327。

<sup>79</sup> 王欽若編：《冊府元龜·卷三十六·帝王部·封禪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刻本，1960年），頁2，總頁393。

<sup>80</sup> 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跡》，頁334。

<sup>81</sup> 參考上註，頁340。

華州父老及百官請求玄宗封西嶽，玄宗並沒有在一開始時就答應，一般而言，皇帝會多次拒絕，但最後由於要求封禪的輿論過於強大而不得不答應。「開元二十三年九月丁卯，文武百官尚書左丞相蕭嵩等，累表請封嵩、華二嶽。」<sup>82</sup>「天寶九載正月丁巳，詔以十一月封華嶽。」然而非常可惜地，3月辛亥，因為華山廟發生火災，加上關內大旱，於是停止封華嶽之舉。<sup>83</sup>

舉此「封華嶽」之例，目的乃在於進一步去理解文人對於此類國家禮典的心態和想法，包括去了解他們何以如此積極地去推動和鼓勵皇帝封禪？其心態為何？

因此，以下將以杜甫為例，嘗試做一演示。杜甫有〈請封西嶽表〉，杜甫在其〈進封西嶽賦表〉中自言自己乃年過四十，是長安一匹夫。而「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罪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杜甫自言其並不敢奢望能得到官職，他更說他能以短篇隻字，一動人主，對他而言，已經是不負自幼多病貧窮好學了。他受到賞識已感到十分光榮，甚至更言「雖死萬足，至於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為的是想報答聖慈，明臣子之效。更何況杜甫說他有肺氣之疾，恐怕自己不久於人世，擔心自己孤負皇恩。於是更作〈封西嶽賦〉以勸，覬明主覽而留意。

因西嶽華山地處首都長安城的西方，屬金。而唐玄宗的本命屬金，故言是「陛下本命」，蓋因玄宗誕生於乙酉年，《淮南子·天文訓》云：「庚辛申酉，金也。」<sup>84</sup>酉屬金，金又當西方，《舊唐書·禮儀志三》云：

玄宗乙酉歲生，以華嶽當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華嶽神為金天王。開元十年，因幸東都，又於華嶽祠前立碑，高五十餘尺。又於嶽上置道士觀，修功德。至天寶九載，又將封禪於華嶽，命御史大夫王鉷開鑿險路以設壇場，會祠堂災而止。

《冊府元龜·卷三十六》，崔翹亦云：「金方正位，合陛下本命之符。」<sup>85</sup>故天寶9載禮部尚書崔翹等，均以此理由（當陛下本命）請求玄宗封禪於西嶽。

<sup>82</sup> 《唐會要·卷八·郊議》，頁137。

<sup>83</sup> 同上註，頁138。

<sup>84</sup> 劉安等編撰、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3，頁124。

<sup>85</sup> 王欽若編：《冊府元龜·卷三十六·帝王部·封禪二》，頁25，總頁405。

其實本命信仰在唐代頗為盛行，<sup>86</sup>玄宗本人對此亦深信不疑，早在先天 2 年，他就封華嶽神為金天王。開元 10 年，又于華嶽祠前立碑，于嶽上置道士觀，修功德。天寶九載，將封禪于華嶽。玄宗早因自己的本命之故而屢有崇重華嶽之舉。唐玄宗有一篇〈西嶽太華山碑〉<sup>87</sup>當是開元 12 年孟冬所作。文中即顯示出玄宗當時就已有想要封禪華山的想法了。

其次，從賈二強〈論唐代的華山信仰〉<sup>88</sup>和王永平〈論唐代的山神崇拜〉<sup>89</sup>二文看來，其實民間崇祀華山早已行之久遠，玄宗之尊崇華山，實際上只是將民間既有的華山信仰納入官方祠祀的正統中，使之正統化和官方化。這在華山信仰的演變史上，完全呈現了由民間小傳統發展從而被納入大傳統的過程。

而杜甫作〈封西嶽賦〉實際上是一場預演的想像，他「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覩聖意，因有感動焉」。<sup>90</sup>故而杜甫此賦是一篇想像之作，他預先模擬想像唐玄宗進行封禪西嶽華山大典的儀式內容，鋪寫而成這一篇〈封西嶽賦〉。依杜甫所言，他在此之前先獻過三大禮賦了。賦云：「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唐玄宗於開元 13 年東封泰山，所以〈封西嶽賦表〉應當獻於天寶 13 年，<sup>91</sup>而且是孟冬之時。如此，則是已知華山廟火災之事。但杜甫仍是將封禪西嶽視為一件重要的大事，並預想撰文，目的都在勸玄宗行封西嶽之禮。

此外，要求封西嶽的還有很多人，例如閻隨侯有〈西嶽望幸賦〉，賦中點明是在「開元十八年」所作，賦中陸續鋪敘「聖人之文教」、「聖人之武功」、「聖人之巡狩」、「聖人之報地」、「聖人之禮天」、「聖人之東封」、「聖人之致孝」，<sup>92</sup>其中強調一點：「王者受命，必升中以因名山，告成功而紀厥美。」<sup>93</sup>接著全以勸封西嶽為主題，如其云：「國家頻成大禮，天下大和，豐穰歲積，符瑞日多，聖人雖欲行謙光遜讓之禮，其如天意人欲何？其如鬼神符

<sup>86</sup> 參見賈二強：〈「本命」略說〉，《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 年第 2 期；劉長東：〈本命信仰考〉，《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1 期。

<sup>87</sup> 參見〔清〕李榕纂輯：《華嶽志·卷六》，收入石光明等編《中華山水志叢刊·山志卷七》（北京：線裝書局，影印道光刻本，2004 年），頁 159。

<sup>88</sup> 賈二強：〈論唐代的華山信仰〉，《中國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sup>89</sup> 王永平：〈論唐代的山神崇拜〉，《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6 期。

<sup>90</sup>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頁 2160。

<sup>91</sup> 開元 13 年東封泰山，開元有 29 年，故開元時之 17 年加天寶之 13 年才差不多 30 年，因此估計〈封西嶽賦〉當作於天寶 13 年。

<sup>92</sup> 閻隨侯：〈西嶽望幸賦〉，《全唐文新編》，卷 400，頁 4606。又見於《文苑英華》第 1 冊，卷 27，頁 122-125。

<sup>93</sup> 《全唐文新編》，卷 400，頁 4607；又見於《文苑英華》第 1 冊，卷 27，頁 123。

命何？誠可備西封之盛儀，採東巡之舊制。」<sup>94</sup>蓋開元 13 年玄宗東封泰山，故此乃欲勸玄宗西封華嶽，「如是則鴻猶振於萬古，盛烈光於千帝」。<sup>95</sup>這是另一則勸封西嶽之賦。

為何這些士人如此渴望皇帝進行封禪？王棨的〈闕里諸生望東封賦〉有一段說法可資參看，王棨此賦表達了闕里諸生渴望皇帝封禪泰山，但皇帝卻「執勞謙之德」，使他們渴望之心頗感遺憾，賦云：

所以山呈瑞應，水出榮光，國泰財阜，時豐俗康，固合陳俎豆，  
捧珪璋，高踐天壇之上，遙昇日觀之傍，而乃闕其儀，寢其議，  
蓋九重之鳳詔缺敷，四海之鴻恩未被。空令漢史，願陪檢玉之  
行；更切孔徒，渴見泥金之事。莫不引領延佇，凝情盡思，未  
遂相如之請，空吟叔寶之詩。夫子壇邊，恐雲龍之會晚；顏生  
巷裡，憂日月以來遲。況可後示百王，前觀萬姓。三千徒兮，  
今日斯懇。……當河清海晏之時，宜遵古典。……宜允儒者之  
心，登泰山而昭告。<sup>96</sup>

此賦可謂寫出了儒生渴望皇帝封禪的心情。而除了泰山的封禪外，前述西嶽華山的封禪，也是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士人們不約而同的一致願望。

起初我們會以為這些人之所以請求皇帝進行封禪是出自於自身的利益，或是為了拍馬屁、歌功頌德。而在《唐會要》中也的確記載了張說因為勸進封禪，事成之後，得到玄宗的封賞，其他的勸進者也一樣，得到好的報酬。然而如果從唐代文士崇禮文化的背景下來看時，當會有不一樣的看法與解讀。以下將再進一步從史籍材料中說明唐代文士的崇禮心態。

## 六、唐代文士之崇禮心態

《唐會要》中記載玄宗泰山封禪之事甚多，在此列出與張說有關之記載三則：

一、開元 13 年 11 月 10 日，式遵故實，有事泰山。<sup>97</sup>

<sup>94</sup> 《全唐文新編》，卷 400，頁 4607。

<sup>95</sup> 同上註。

<sup>96</sup> 王棨：〈闕里諸生望東封賦〉，《全唐文新編》，卷 769，頁 9175。又見於《歷代賦彙》，卷 57，頁 8-9。

<sup>97</sup> 《唐會要·卷八》，頁 108。

二、開元 12 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群臣多言封禪，中書令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 13 年有事泰山。於是說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縚、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士博士侯行果，刊定儀注。<sup>98</sup>

三、唐張說〈封禪壇頌〉：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sup>99</sup>

從玄宗開元 13 年這次的封禪之禮來看，張說可說扮演著一個主導者的角色，主導著這一場泰山封禪之禮。張說為什麼如此積極地要求唐玄宗行封禪禮？

雖然何平立《巡狩與封禪》書中對於唐玄宗開元封禪禮的意義，有很多精闢的見解和分析，最主要是說玄宗之封禪具有撥亂反正，革正斯禮的意義，掃除武后、韋后等曾在神聖儀式上的影響，重新確立皇朝思想信仰與社會秩序的合法性與合理性。<sup>100</sup>但是何平立之論說仍是從統治者謀求自身利益的角度或政治作用的角度來論述的。本文在此所欲著重強調者乃是唐代文士的崇禮文化及心態。張說可能也有一些個人或是基於國家大業上的政治考量，如前述何平立所分析的那樣，但一方面也有著對於禮文化的推崇和導正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在。《新唐書·張說傳》記載：「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sup>101</sup>由此看到張說對於禮的尊崇與實踐，而這種「獨以禮終，天下高之」的說法，也顯示了唐代文士社會對於禮文化的尊崇。

唐代典禮賦的許多作者都如同張說一般，是唐代的文士，他們也有重視禮文化的一面，以下舉例說明。例如劉允濟，著有〈天賦〉、〈地賦〉、〈明堂賦〉和〈萬象明堂賦〉，《新唐書·文藝中》記載：劉允濟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手詔褒容，除著作郎。後來被來俊臣構陷，幾死，會赦免，貶大庾尉。復為著作佐郎，脩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受米，僕乃視如浮雲耳。」<sup>102</sup>可見劉允濟於武后明堂建成後，撰寫〈明堂賦〉並不是為了貪圖利益而作。

又如韓休，著有〈奉和聖製喜雨賦〉、〈駕幸華清宮賦〉，〈喜雨賦〉見於《文苑英華》卷 14 頁 67-68，蓋因久未降雨，玄宗齋戒祈雨，後果見降雨，

<sup>98</sup> 同上註，頁 108。

<sup>99</sup> 同上註，頁 119。

<sup>100</sup> 參見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跡》，頁 365-372。

<sup>101</sup> 《新唐書·張說傳》，卷 125，頁 4406。

<sup>102</sup> 《新唐書·文藝中·劉允濟傳》，卷 202，頁 5749。

故玄宗作〈喜雨賦〉，張說、韓休、徐安貞、賈登、李宙等人皆奉和之。雖然韓休〈喜雨賦〉作品中充滿歌功頌德之辭，如：「一人有慶，萬國歡心。群臣獻華，封之壽天。」但《新唐書》中言韓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其為人正直，史載其敷陳治道，多許直。<sup>103</sup>由此可見在看待唐賦中歌功頌德之辭時，不宜斷然以此論斷作者的人格，或流於刻板的印象。

又如常袞，撰有〈浮萍賦〉、〈春蒐賦〉，史稱其「狷潔」。<sup>104</sup>又如蕭昕，著有〈鄉飲賦〉、〈總章右个賦〉、〈仲冬時令賦〉、〈上林白鹿賦〉四篇賦，觀其所著四篇賦作，除〈上林白鹿賦〉外，其餘3篇都與禮有關。又如徐彥伯，著有〈南郊賦〉，卒於開元3年，史稱：彥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縟。其品德，史傳載：彥伯事寡嫂謹，撫諸姪同己姓。<sup>105</sup>雖未明言其於禮之致力，但亦見其自身修養之嚴謹。

在行郊禮的這一制度的落實上，王仲丘、張九齡都曾經上書強烈要求過要落實郊禮之制。王仲丘上言主張：偏祭五方帝。認為：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為一。<sup>106</sup>認為五帝要分別依時、依方祭祀，不能簡省為一。而張九齡亦有勸唐玄宗行郊禮之疏，張九齡〈請行郊祀之禮疏〉強調：「伏以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之義，蓋以敬天命以報所受。」<sup>107</sup>而這郊祀之禮是不能因為任何理由而有所闕的，疏中一再引述古人之言，強調郊祀之禮的重要性。王涇的《大唐郊祀錄·序》亦云：「臣聞在昔聖王之御宇也，仰則觀天以知變，俯則考地以取象，因順變之道，作為禮樂，化成人文，以光天下者，莫大乎郊祀。」

無論是強調郊祀重要性的王涇、張九齡，或是寫作典禮賦的蕭昕、劉允濟、徐彥伯，或是鼓吹皇帝進行封禪的張說、杜甫、閻隨侯，這些不同的人之間，從他們的作品和言論中，都可以看出他們具有某種特定的、共同的信仰和信念。具有儒家士人直諫典型的韓休，或是被正史稱為「狷潔」的常袞，或是不能為金錢所惑的劉允濟，他們都寫了具有歌頌功德之辭的賦作，但是這在他們而言，其在賦作中表現的思想，和他們平時素行之立身處世之道是一致而不相衝突的。於是我們有必要去深入理解他們背後的那個信仰和信念。

<sup>103</sup> 《新唐書·韓休傳》，卷126，頁4433。

<sup>104</sup> 《新唐書·常袞傳》，卷150，頁4809。

<sup>105</sup> 《新唐書·徐彥伯傳》，卷114，頁4201-4202。

<sup>106</sup> 《新唐書·王仲丘傳》，卷200，頁5700。

<sup>107</sup> 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下冊，卷20，頁1091。

正如同杜甫、閻隨侯作賦堅請玄宗封禪華山一樣，作者這麼做的理由恐怕不能僅被單一化地解讀為是出自於個人一己私利的渴望，或視其為貪求一己之功名利祿。可能更需要從他們背後具有共同的禮文化信仰來看，正如第五節末所引之王棨〈闕里諸生請東封賦〉中所述一般，崇尚禮樂制度本就是儒生們共同的文化信仰和信念。他們期望帝王能夠恢復古禮。這一點亦可從《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載司馬談因不得參與漢武帝封禪之禮，「發憤且卒」<sup>108</sup>這一點去體會。

張說、蕭昕，以及許多士人，堅持皇帝應行郊祀之禮，因為他們相信聖人所傳經書中所說的話語。他們相信要依《禮記·月令》的時令行事，從而恢復古禮，或是去擬訂新的一套他們心目中理想的上古禮制。

例如修建明堂便是一件國家大事。唐代的明堂已不是那個三代之時原始而簡陋的建築了，在武則天的期待下，建造出一個富麗堂皇，非常具有時代意義，很符合時代潮流的聖殿，依照聖賢所言，經過反覆推敲、考證才蓋出來的「明堂」。

從上述的資料看來，會發現：其實唐代國家的禮制該怎麼實行，並不是完全以皇帝的想法為主，有時反而是儒生如張說、徐堅、王仲丘、張九齡等在主導著皇帝該怎麼做。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一切都得依照時令，即使是皇帝也不能違反。而春夏秋冬，隨著不同的季節來臨，各有不同的國家典禮要進行，而這是固定的、規律的行程，皇帝必須依照時令和禮制行禮。換言之，禮制乃是在建立起一套國家制度，而此一制度的建立，將使國家運行有準則和規律，並非單單依靠皇帝一人喜怒與好惡，並非隨興而行。而這充滿了宗教信仰的敬神之禮，也使得皇帝及百官在面對天地自然萬物之時懂得謙卑，懂得禮敬，收斂起其專制無上的權力。這禮神敬天的背後自是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即已有之的泛神信仰、民間宗教，但卻在土人崇禮的信仰中又被納入到國家儀典之中，成為官方例行的祭典。

## 七、結論

綜合以上所述，本文以唐代典禮賦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參酌唐代國家典禮之相關史料記載，對唐代典禮賦的價值、重要性及其解讀提出了若干看法，解答一些先前閱讀的困惑，得到以下五點結論：一、由唐代典禮賦的數量之多，

---

<sup>108</sup> 參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卷 130，頁 3295。

可以看出唐代文士對典禮賦的重視。二、由典禮賦及賦家傳記、相關資料中可以看出賦家的崇禮心態。三、典禮賦中可以呈現出唐代的國家禮制，值得吾人加以重視。四、唐代典禮賦較前代同類賦作數量更多、更完整，同時又輔以國家對典禮的重視及科舉考試的需要，使得這類賦作蘊含了豐富的社會文化意義在其中，其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五、研讀唐代典禮賦，有必要理解作者的寫作心態，是以必須掌握唐代的時代氛圍和文士心態，以作出適切的理解。由前述的探討中可知：唐代的典禮賦並非只是紙上文章，也不是文人空想或虛擬之作，而是具有實際經驗的。例如賦題中寫到有事於南郊或郊天之日者，皆指的是南郊祭天之禮，這是最重要的國家祭禮，地點在城南的圜丘，參與的有大小文武百官，有祥雲出現，太史會報，於是大家跟著一起歡欣鼓舞，充滿著濃厚的節慶意味。例如元稹〈郊天日五色祥雲賦〉歌詠五色祥雲，唐賦中這類大量的歌詠祥瑞之作，均可一視同仁看待，元稹視自己與群臣、皇帝、百姓皆為國家的生命共同體，故而祥瑞的出現也跟著由衷地感到高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祭祀典禮中由於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場合，行禮的場所和整體營造的氛圍都特別具有濃厚的宗教性，於是皇帝和文武百官們置身於一個神聖空間之中，在這充滿宗教符號的場所中，搭配著嚴肅的儀式進行和宗教儀典的音樂，有條不紊地掌握著每一個細節，唯恐有任何錯誤及閃失。在這樣的場所中洋溢著濃厚的宗教氣息，在群體意識的引導下，眾人有著共同一致的信仰，他們在這充滿莊嚴與神聖的儀式中合而為一，有著共同一致的目標，祈求國家的國泰民安與國運昌隆。典禮賦中許多頌德之辭相信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作完成的，因此透過宗教人類學或宗教社會學的方式亦將有助於我們去理解這些典禮賦。

士人以聖人所傳之經書作為實現具體典禮的最高指導原則。雖然彼此之間有不同的見解、有爭辯，如明堂是五室還是九室？封禪儀注中的先燔後祭或是先祭後燔？<sup>109</sup>但這些都只是過程，最終的目標仍是要實際地去行禮，去完成這一典禮、儀式。因而，在經書之中，禮樂可說是最能付諸實踐，實際拿出來執行的。而在唐賦中，典禮賦可說是反映了唐代士人在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集體的文化心靈。

【責任編校：林淑禎】

<sup>109</sup> 參見《新唐書·康子元傳》，卷 200，頁 5701。

附表一：《文苑英華》第一冊禋祀類收錄賦作一覽表

編號	篇名	作者	卷／頁
1	南郊賦	徐彥伯	v54/p242
2	朝獻太清宮賦	杜甫	v54/p244
3	朝享太廟賦	杜甫	v54/p245
4	有事于南郊賦	杜甫	v54/p246
5	至日圓丘祀昊天上帝賦	蕭穎士	v55/p248
6	至日圓丘祀昊天上帝賦	賈餗	v55/p248
7	東郊迎氣賦		v55/p248
8	東郊迎春賦	王起	v55/p249
9	東郊迎春賦	謝觀	v55/p249
10	西郊迎秋賦	張秀明	v55/p250
11	西郊迎秋賦	馬逢	v55/p250
12	北郊迎冬賦	王起	v55/p250
13	東郊朝日賦	陸贊	v55/p251
14	南郊享壽星賦	周鈴	v55/p251
15	迎長日賦	柳宗元	v56/p252
16	迎長日賦	李程	v56/p253
17	禋六宗賦	王起	v56/p253
18	祠靈星賦		v56/p253
19	祀后土賦	張餘慶	v56/p254
20	大蜡賦	楊諫	v56/p254
21	焚柴賦	何廻	v56/p255
22	雍畤舉燭火賦	王起	v56/p255
23	郊特牲賦	韋充	v56/p256
24	明水賦	崔損	v57/p257
25	明水賦	夏稜	v57/p257
26	明水賦	歐陽詹	v57/p257
27	明水賦	韓愈	v57/p258
28	明水賦	陳羽	v57/p258
29	明水賦		v57/p259
30	大羹賦	施肩吾	v57/p259
31	象樽賦		v57/p260
32	黃目樽賦	李程	v57/p260
33	黃目樽賦	裴度	v57/p260

附表二：《歷代賦彙》典禮類收錄唐代賦作一覽表

編號	篇名	作者	卷/頁
1	南蠻北狄同日朝見賦	穆寂	v47/p2
2	南蠻北狄同日朝見賦	王起	v47/p3
3	朝呼韓邪賦	闕名	v47/p3
4	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賦	謝觀	v47/p4
5	叔孫通定朝儀賦	白居易	v47/p5
6	南郊賦	徐彥伯	v47/p18
7	有事于南郊賦	杜甫	v47/p20
8	至日圓丘祀昊天上帝賦	蕭穎士	v47/p23
9	至日圓丘祀昊天上帝賦	賈餗	v47/p24
10	迎長日賦	柳宗元	v48/p27
11	迎長日賦	李程	v48/p28
12	焚柴賦	何迴	v48/p29
13	郊特牲賦	韋充	v48/p29
14	雍時舉燿火賦	王起	v48/p30
15	祀后土賦	張餘慶	v49/p2
16	禋六宗賦	王起	v49/p3
17	祀靈星賦	闕名	v49/p4
18	南郊享壽星賦	周鈴	v49/p5
19	東郊朝日賦	陸贊	v49/p5
20	東郊迎氣賦	賈餗	v49/p6
21	東郊迎春賦	王起	v49/p7
22	東郊迎春賦	謝觀	v49/p8
23	西郊迎秋賦	張秀明	v49/p10
24	西郊迎秋賦	馬逢	v49/p10
25	北郊迎冬賦	王起	v49/p11
26	大蜡賦	楊諫	v49/p12
27	朝獻太清宮賦	杜甫	v49/p13
28	朝享太廟賦	杜甫	v49/p15
29	封西嶽賦	杜甫	v49/p17
30	黃目樽賦	李程	v50/p4
31	黃目樽賦	裴度	v50/p5
32	象樽賦	闕名	v50/p6
33	太羹賦	施肩吾	v50/p7

34	明水賦	崔損	v50/p8
35	明水賦	夏稜	v50/p8
36	明水賦	歐陽詹	v50/p9
37	明水賦	韓愈	v50/p10
38	明水賦	陳羽	v50/p11
39	明水賦	闕名	v50/p12
40	庭燎賦	王起	v50/p17
41	庭燎賦	楊濤	v50/p18
42	藉田賦	闕名	v51/p3
43	藉田賦	李蒙	v51/p4
44	藉田賦	石貫	v51/p5
45	藉弄田賦	王棨	v51/p14
46	千畝望幸賦	闕名	v51/p15
47	貢士謁文宣王賦	黎逢	v52/p1
48	太學觀春宮齒胄賦	闕名	v52/p1
49	貢舉人見於含元殿賦	闕名	v52/p3
50	鄉飲賦	闕名	v52/p22
51	正月一日含元殿觀百獸率舞賦	鄭錫	v52/p31
52	千秋節勤政樓下觀舞馬賦	錢起	v52/p32

附表三：唐代典禮賦之禮目架構一覽表

任爽《唐代禮制研究》 唐代禮制架構		《大唐開元禮》 禮目	唐代典禮賦篇目
吉禮	A.昊天上帝與五方帝	1. 冬至祀圜丘	1. 蕭穎士〈至日圜丘祀昊天上帝賦〉 2. 賈餗〈至日圜丘祀昊天上帝賦〉 3. 元稹〈郊天日五色祥雲賦〉 3. 崔立之〈南至郊壇有司書雲物賦〉 4. 郭遵〈南至郊祭司天奏雲物賦〉 5. 徐彥伯〈南郊賦〉 6. 杜甫〈有事於南郊賦〉 7. 〈迎長日賦〉
		2. 正月上辛祈穀於圜丘	
		3. 季秋大享於明堂	
		4. 季夏土王日祀黃帝於南郊	
		5. 立秋祀白帝於西郊	馬逢〈西郊迎秋賦〉 張秀明〈西郊迎秋賦〉
		6. 立冬祀黑帝於北郊	王起〈北郊迎冬賦〉
		7. 春分朝日於東郊	王起〈東郊迎春賦〉 謝觀〈東郊迎春賦〉 陸贊〈東郊朝日賦〉 李為〈日賦〉 王奉珪〈日賦〉 李邕〈日賦〉
		8. 祀靈星	〈祀靈星賦〉 郗昂〈老人星賦〉 楊炯〈老人星賦〉 周鈴〈南郊享壽星賦〉
	C.地祇與后土	9. 夏至祭於方丘 (皇地祇)	〈祀后土賦〉

	D.百神與五龍	10.皇帝臘日蜡百 神於南郊	〈大蜡賦〉 〈蜡日祈天宗賦〉
	E.祖宗與玄元皇帝	11.時享於太廟	杜甫〈朝享太廟賦〉 杜甫〈朝獻太清宮賦〉
吉禮	F.社稷與先農先蚕	12.孟春吉亥享先 農—耕藉	〈藉田賦〉 〈藉田賦〉 〈藉田賦〉 〈千畝望幸賦〉 〈觀農賦〉 〈耕弄田賦〉
	G.風雨雷與司寒	13.孟冬祭司寒 (納冰、開冰 附)	〈藏冰賦〉 〈藏冰賦〉 〈開冰賦〉
	H.嶽鎮海瀆與封禪	14.封祀於太山	〈闕里諸生望東封賦〉 〈焚柴賦〉
		15.禪於社首山	
		16.祭五嶽四鎮	王起〈雍畤舉權火賦〉 杜甫〈封西嶽賦〉 閻隨侯〈西嶽望幸賦〉
		17.時旱祈於(1)太 廟(2)太社(3)祈 嶽鎮於北郊	唐玄宗、張說、韓休、徐安貞、 賈登、李宙等人之〈喜雨賦〉
		18.皇帝皇太子視 學	朱休〈駕幸太學賦〉 〈太學觀春宮齒胄賦〉
		19.國子釋奠於孔 宣父	黎逢〈貢士謁文宣王賦〉 〈太學釋奠觀古樂賦〉
		20.其他	〈禋六宗賦〉 〈勤政樓視朔觀雲物賦〉 〈土牛賦〉
賓禮	A.蕃夷	21.蕃國王來朝	王起〈南蠻北狄同日朝見賦〉 穆寂〈南蠻北狄同日朝見賦〉
軍禮	A.親征與巡狩	巡狩(1)告於圓丘 (2)告於太社(3)告 於太廟	
	B.飲至		李子卿〈飲至賦〉 崔損〈飲至賦〉

	C.講武與田狩	22.講武	趙子卿〈出師賦〉 趙自勵〈出師賦〉 梁獻〈出師賦〉
軍禮			〈開三面網賦〉 裴度〈三驅賦〉 〈大閱賦〉 胡瑱〈大閱賦〉 〈春蒐賦〉
			D.大射與觀射
			23.皇帝觀射於射宮
			〈射宮試貢士賦〉
			E.饗
嘉禮	A.朝參與朝賀	24.大饗	〈大饗賦〉
	B.讀時令	25.千秋節受群臣朝賀	趙自勵〈八月五日花萼樓賜百官明鏡賦〉
	C.鄉飲酒	26.皇帝於明堂讀春令、讀夏令、讀秋令、讀冬令；太極殿讀五時令	〈讀春令賦〉
		27.鄉飲酒	蕭昕〈鄉飲酒賦〉

附表四：楊寬〈月令考〉中所列《呂紀》《月令》五行說一覽表

四時 五行	春	夏	中央	秋	冬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四方	東	南	中	西	北
十日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五帝 <sup>110</sup>	太皞 (太昊)	炎帝	黃帝	少皞 (少昊)	顓頊
五神	句芒	祝融 (朱明)	后土	蓐收	玄冥
五星 <sup>111</sup>	歲星	熒惑	鎮星	太白	辰星
五獸	蒼龍	朱鳥	黃龍	白虎	玄武
五帝色 <sup>112</sup>	青帝 (蒼帝)	赤帝	黃帝	白帝	黑帝
五帝名	靈威仰	赤熛怒	含樞紐	白招拒	叶光紀
五蟲	鱗	羽	倮	毛	介
五音	角	徵	宮	商	羽
十二律	太簇 夾鍾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黃鍾 大呂
五數	八	九	五	七	六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臭	膶	焦	香	腥	朽
五祀	戶	灶	中霤	門	行
五祀祭先品	脾	肺	心	肝	腎
明堂	青陽	明堂	太廟	總章	玄堂
五色	青	赤	黃	白	黑
五穀	麥	菽	稷	麻	黍
五牲	羊	雞	牛	犬	彘

<sup>110</sup> 有關五帝、五神在先秦兩漢文獻中之異說，可參見黃銘崇博士論文（Hwan, Ming-chorng.Ming-tang: cosmology, political order and monuments in early China. Diss.Harvard university, 1996.），頁791有列一張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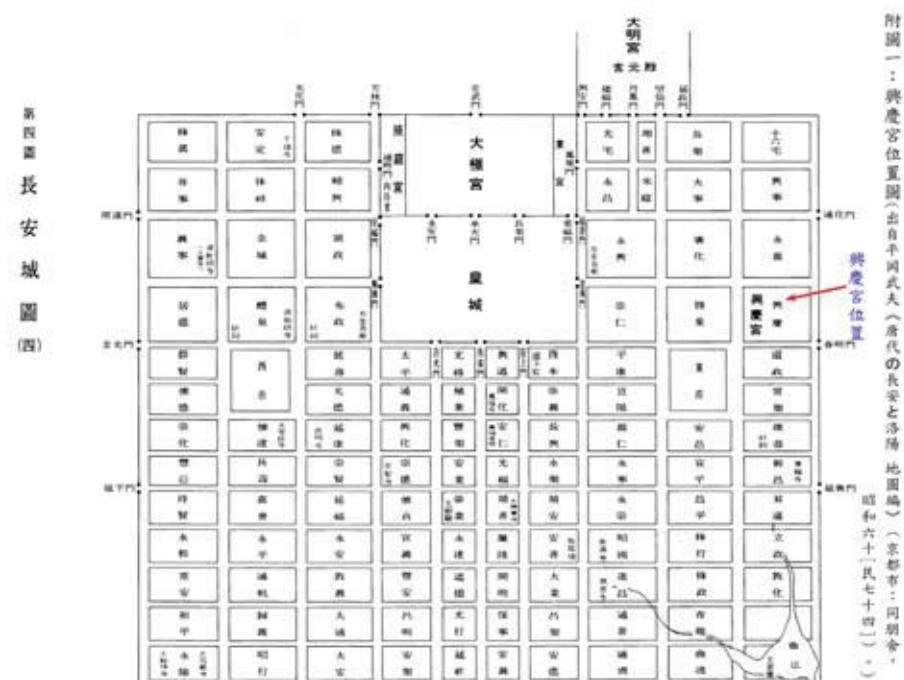
<sup>111</sup> 表中黑體字部分係筆者依《淮南子·天文訓》所加。

<sup>112</sup> 標楷體字為筆者所加，此係鄭玄之說，又見於〔唐〕賈公彥《周禮·天官·大宰》「祀五帝」疏（南昌府學本《十三經注疏》），《春秋緯·文耀鈞》〔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亦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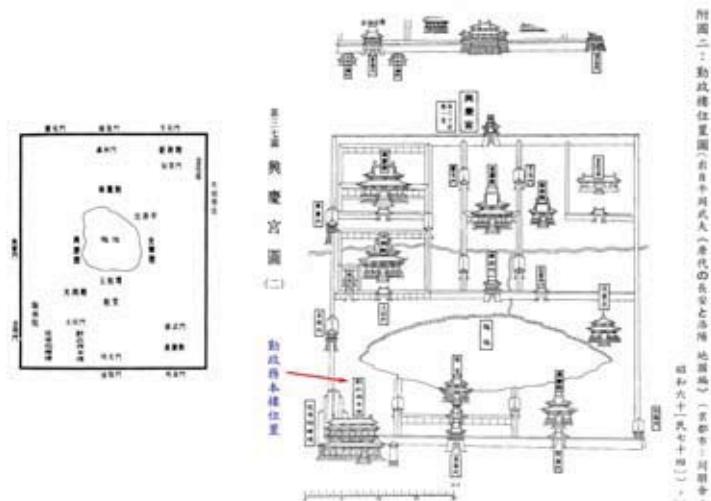
附表五：月令、律呂、明堂居處配置表

月	律呂	天子明堂居處	
孟春	大簇	青陽左个	寅
仲春	夾鍾	青陽大廟	卯
季春	姑洗	青陽右个	辰
孟夏	中呂	明堂左个	巳
仲夏	蕤賓	明堂大廟	午
季夏	林鍾	明堂右个	未
中央土	黃鍾	大廟大室	
孟秋	夷則	總章左个	申
仲秋	南呂	總章大廟	酉
季秋	無射	總章右个	戌
孟冬	應鍾	玄堂左个	亥
仲冬	黃鍾	玄堂太廟	子
季冬	大呂	玄堂右个	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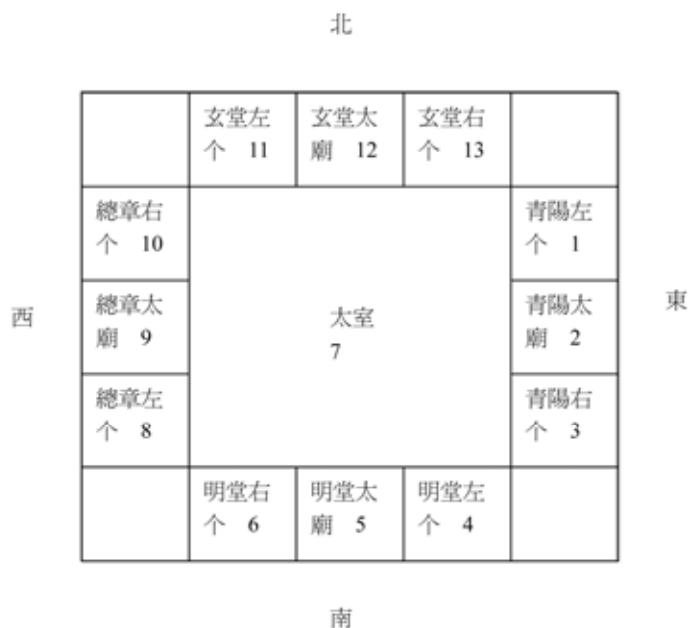
附圖一



附圖二



附圖三



附圖三：〈月令〉天子居明堂位置圖

註：此圖係大抵依據黃銘崇博士論文頁 701 所繪，略加修改而成。改動的部分在於原黃圖數字只有十二，此則為十三。

## 主要參考文獻

### 專著

- 王涇：《大唐郊祀錄》（與《大唐開元禮》合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刻本，1960年。
- 王溥：《唐會要》，臺北：世界書局，1974年。
- 司馬光：《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司馬遷：《史記》，點校本，臺北：鼎文書局，1993年。
- 平岡武夫：《唐代の長安と洛陽・地圖編》，京都市：同朋舍，昭和60年（1985年）。
- 任爽：《唐代禮制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迹》，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
- 佚名：《三輔黃圖》，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
- 李昉等編：《文苑英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明刊本，1979年。
- 李榕纂輯：《華嶽志》，收入石光明等編：《中華山水志叢刊·山志卷七》，北京：線裝書局，影印道光刻本，2004年。
- 杜甫撰、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
-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 徐松：《兩京城坊考》（與《三輔黃圖》合刊），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
- 班固撰、陳立疏證、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集注》，點校本，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
- 袁宏：《後漢紀》（與《漢紀》合刊，書名《兩漢紀》），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張文昌：《唐代禮典的編纂與傳承——以大唐開元禮為中心》，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97年6月碩士論文。
- 許結：《賦體文學的文化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陳元龍輯：《御定歷代賦彙》，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清康熙四十五年刻本，1974年。
- 湯貴仁：《泰山封禪與祭祀》，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
- 費振剛等校注：《全漢賦校注》，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南昌府學本，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93年。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正義》，南昌府學本，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93年。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注》，臺北：華正書局影印新校胡刻宋本，1974年。

蕭嵩編撰：《大唐開元禮》（與《大唐郊祀祿》合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Hwan, Ming-chorng, “*Ming-tang: Cosmology, Political Order and Monuments in Early China*”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期刊論文**

王永平：〈論唐代的山神崇拜〉，《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

楊寬：〈月令考〉，收入氏著《楊寬古史論文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劉長東：〈本命信仰考〉，《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 審查意見摘要

#### 第一位審查人：

歷來觀察唐代賦篇，大多從律體、騷體、駢賦、古賦、大賦等分論，亦即偏向形式體製的書寫考察。本文則以主題視角切入，專述唐代典禮賦，不僅關注較不為人知的賦篇，同時觸及背後之文化意涵，考察文人創作的實際經驗與價值信仰。也因此不強調賦作之體製結構，書寫技巧等分析，而是扣合禮制文化的特殊性，抽剝出解讀賦篇關鍵，諸如月令與五行之文化符碼、書寫虛實、禮的崇仰和實踐，以及文士對禮的重視。如此一來，確實能突顯唐代典禮賦之重要意義，也就是文士重視禮制的主因安放在儒家崇仰和實踐的價值脈絡仍嫌不足。祭祀典禮的社會性、宗教性更值得深入探討，方能另闢蹊徑，突顯典禮賦所呈現唐代特殊之時代意義與文化意涵，或可補一般論述禮制文化側重儒家精神之不足。

#### 第二位審查人：

作者蒐求許多唐代典禮賦資料，探索相關的文化背景，掌握其解讀的關鍵和文化符碼，從而對唐代典禮賦作出解釋，是一篇很下功夫的論文。文中提出唐代典禮以「吉禮」為重，唐代文人配合月令的作為，以及出自內心的崇禮行動，使我們能夠透過唐代典禮賦更深入地瞭解當時的禮文化，這些都是信而有徵的論述。不過，在說明唐代儒生張說、徐堅、王仲丘、張九齡等主導皇帝該怎麼遵循大典的進行時，可能過度強調文臣的力量，而忽略了當時乃是君臣上下共同提倡儒學教化的努力的事實，這可從《全唐文》載太宗至玄宗年間，許多出自皇帝的詔書，以及當時舉賢良方正策等，得知朝廷早有逐步重視儒學教化的走向，並非完全處於被動的態勢。

